

诗路花语:李清照与狄金森咏花诗之比较

张 晓 舸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文章从李清照和狄金森诗歌中花意象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不同内涵、不同基调出发,探索引发这种差异背后的艺术家创作个性以及她们长期浸润的中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模式、诗学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受中国文学深厚的比兴传统的影响,易安咏花词重神轻形,五彩纷呈的花意象象征着女词人高洁孤傲和卓尔不群的人格。但女词人终不堪封建礼教与传统诗学的重重束缚,哀怨郁结遂成为未走出男权文化樊篱的易安咏花词的主要基调。狄金森以花来象征女性意识,其诗作中“花”意象的变迁充分体现了女性从被动走向自主的转变过程。深受人文主义、超验主义影响的狄金森,其咏花诗所散发出的强烈的个体意识使她成功地突破并超越了男权文化传统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模式,凸显了女性的自强、自立和自尊。

[关键词] 花意象; 李清照; 比兴; 儒家伦观; 狄金森; 男权文化中心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108-04

一 前言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常以花喻女子,如: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白居易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罗伯特·彭斯的“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文人爱花、咏花,以花喻人、以花言志者不可胜数,在女诗人笔下,花意象更成为她们生命的一种寄托和情感的一种升华。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爱花,在现今被确认为李清照的40余首词中,竟有35首写到花,确指的花有梅、菊、桂、荷、海棠、梨花、茶藤、芭蕉等八种。美国女诗人狄金森也爱花,她笔下的花从狂野的玫瑰、孤傲的石榴、清幽的紫罗兰,品种多达四十余种。不同种类的花,在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里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传达出不同的情感美学思想,促使她们走上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发展道路。本文从李清照与狄金森诗歌中的花意象入手,着力探讨引发这种差异的历史文化成因。

二 此花不与群花比——李清照诗歌中的花意象

中国人赏花,不仅仅在于赏形、观色,而更为关注花的文化意蕴。不同种类的花,因其花期、花形、花色等的种种不同,其文化内涵亦大有差异。“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1]在富有诗意的中国文人眼里,五彩纷呈的花意象早已成为文人隐喻自己志向的媒介。屈原在《离骚》中就用“香草”、“美人”寄托自己的忠君报国之意。

中国文人赏花、咏花而不滞于花源于中国文学深厚的比

兴传统。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就开比兴之先河,强调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花品喻人品成为李清照咏花词的一大特色。

易安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位于“花中四君子”之首的梅花。受比兴传统的影响,宋人咏梅,不耽于梅花表层特性的描绘,而是不遗余力地开辟花心与人心的互通点,使其成为高洁人格的象征。如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借梅花表明诗人虽备受打压,也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赵长卿的“芳心自与群花别,尽孤高清洁”,借梅花表明自己轻视功名利禄、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林逋的“众芳摇落独鲜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则是借梅花表明自己“梅妻鹤子”、超然物外的情思。在此风尚的驱使下,李清照所作咏梅词无不是“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充分展示出屈夫子托物取兴的精髓。《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上阕用拟人的手法,把半开的梅花比作刚出浴的美人,那清丽娇柔、雅洁素艳的梅花是正值豆蔻年华、才华横溢的女词人形象的外化。“此花不与群花比”则是李清照对梅花不事铅华的自然之态、超尘脱俗的洁美素质和秀拔独立的坚强个性的夸赞。在这里,梅花既是审美的主体,又代表了女词人对美好人格精神的追求和期待,昭显了女词人蔑视尘俗、孤标傲世的一面。类似思想在李清照的咏梅词中屡见不鲜。在《满庭芳·小阁藏春》一词中,词人对梅花“难堪雨藉,不耐

[收稿日期] 2008-04-16

[作者简介] 张晓舸(1972-),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风揉”以至“香消雪减”、风韵不存的命运表现出无限的同情。因为这是花的命运,也是被深深的庭院所禁锢的女词人的命运。但诗歌以“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结尾,于从容婉约中显示出梅的铮铮傲骨,表明了女词人睥睨流俗的高尚情操。

菊与梅一样,历来也是中国文人表现自己不同流俗品格的载体。菊花凌霜傲放,凋残而不染尘,故宋代郑思肖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之语。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饮露餐花象征自己品行的高尚和不同流合污的决心。菊圣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以隐逸者的姿态,赋予菊花卓而不群的雅士风范。李清照咏菊几乎皆以高逸峻洁的屈原风范为旨归,最典型的当属《多丽·小楼寒》一词。在寻求可资比拟的美的意象时,女词人不取贵妃之醉脸、孙寿之愁眉,也不取韩令徐娘的风流韵事,而代之以清雅高洁之白菊。“潇潇无情风雨”使得娇丽的白菊日渐凋萎,“汉皋解佩”、“纨扇题诗”等种种人事变迁使得本该受到人们细心呵护的花儿更添憔悴,但正是在经受夜来风雨的揉藉之中,白菊昭显出内隐于女词人心中的那种高标逸韵、傲岸不屈的精神。

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4]桂于是成为超凡绝尘、孤高傲世的象征。又传说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卉,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很不平,遂发出“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的感慨。在《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一词中,李清照以“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说明桂花虽无耀眼悦目之光泽,又乏浓艳娇媚之颜色,却香飘人间,突出桂花温雅、内敛的品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则借桂花之口将女词人卓而不群、豪放超迈、自尊自信的个性抒写得淋漓尽致。

作为封建知识女性的李清照,其词作中的花意象不仅带有传统的文学与文化色彩,更是深深地烙上了女词人的生命和情感印痕。从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到独守空闺的怨妇,再到孤苦伶仃的孀妇,花意象始终贯穿于易安词之中,并随着女词人情感生命的跌宕起伏而呈现出花开花落的生命轨迹。

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天真浪漫,如含苞欲放的花蕾,虽生活在理学兴起的时代,但开明的家庭环境,促使她形成开朗活泼的个性。因此,此间所作的咏花词语新意隽,既有“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的活泼欢愉,也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的惜花之情,更有“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的娇羞憨痴。婚后的李清照,虽说夫妻间琴瑟和谐,但除屏居青州的十年外,夫妻俩聚少离多,因此,此间所作的咏花词缠绵悱恻、婉约动人,抒发了女词人“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的相思之苦、“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蝶恋花》)的无奈和“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的自怜。在历经朋党之争、丈夫的“天台之遇”和北宋灭亡之后,李清照

遍尝人间百味,更趋成熟与激烈,其咏花词遂流露出对社会陋俗的厌憎与对朝庭腐败的唾弃。“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正是她睥睨群小、自爱自珍的激越情怀的集中体现。晚年孀居时的李清照孤苦伶仃,若花凋香残,此间所作咏花词尽露沧桑、内敛之情,有“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诉衷情》)的寂寥,“揆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清平乐》)的痛楚,“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声声慢》)的悲怆和“疏影尚风流”(《满庭芳》)的傲气与风骨。

然而,不论是少女时的“秋已暮,红稀香少”,还是晚年的“揆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李清照的咏花词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情结,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宋代是孔孟儒学向程朱理学转化的时代。理学使儒家礼教进一步系统化,在压制女性方面也更为残酷。除要求女子遵循“三从四德”外,对女子的言行都予以严苛的要求——“凡为女子,先学立身……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5]妇女被排斥在政治社会之外,沦为男权社会的点缀品。深陷男权中心文化之中的李清照虽有“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渔家傲》)的鸿鹄之志,敢于蔑视礼法,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论,奈何她闯入了男人的文化禁地,在提倡“才藻非女子事”的宋代是绝不能容忍一名女子压倒须眉,成为“闺阁中之苏、辛”^[6]的。

其二,儒家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内敛性格,以含而不露、温文尔雅为君子的理想人格。对于语言,儒家主张慎言,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7]在为诗之道上则要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8]“发乎情、止乎礼义”。^[9]正因为此,李清照咏花词中“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等言情之辞被委以教化重任的封建文坛斥为“闺巷荒淫之语”。^[10]所做《词论》因有批评男性词人的言论而倍受打击,认为“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11]

其三,中国文化属于人伦型文化,重血亲,轻个人,个体的独立人格往往被家国利益所遮蔽。受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倍受封建文坛排斥之苦的李清照在情感上、心理上更加依赖丈夫、依赖家庭。奈何在纳妾和冶游盛行的宋代,赵明诚也不免有“天台之遇”、“武陵之游”,再加上“赵君无嗣”,因此李清照绝大多数咏花词都带有一种凄凄凉婉的色彩,最典型的当属《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赵明诚过世后,李清照更是失去了生活的支柱,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民族集体意识使她又不可能寄托于来世,因此,其咏花词中充斥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和“物事人非事事休”的悲怆。在《声声慢·寻寻觅觅》中,李清照将自己比作暴风雨过后的“黄花”,无力挽留华茂的花瓣,只剩下一具空壳。而

“黄花”与“风急”、“雁过”、“梧桐”、“细雨”、“黄昏”等意象的并置更凸显出女词人凄苦哀怨的内心世界。在《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中,李清照和着千古“梅心惊破”的《梅花落》怨曲去描摹梅花,用自己的“千行泪”、“断肠”使梅花蒙上忧凄愁苦的浓重色彩。

在男权社会中,李清照如一枝“独先天下春”的寒梅,难逃霜欺雪压的命运和独处严寒的孤独,这孤独源于对丈夫的刻骨铭心的相思,更源于才思受到压制的苦闷。儒家伦理观、诗学观束缚着李清照,使她不能大笔直书,只能寄语群花,以花为载体,以含蓄、婉约的方式将自己想说却又不能明说的千般情丝表述出来。李清照咏花词中那一个个孤独的花意象就是处于封建礼教重压之下女词人的化身,也是处于封建礼教压迫之下中国古代妇女身心备受摧残却又投诉无门的真实写照。

三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狄金森诗歌中的花意象

狄金森爱花,常用花意象来象征女性意识,从狄金森诗歌中花意象的演变可以清楚地感知其女性意识从蒙昧到觉醒的转变过程。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由于长期受男权中心文化和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众多文学人物形象呈二元对立局面,女性形象常常呈现出“百合”和“玫瑰”两个极端。在西方,《圣经》及古希腊、罗马神话对玫瑰极富抒情性的描述,为西方文学将玫瑰、美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思维定势。男性作家常将心上人比作娇艳欲滴的玫瑰并竭尽其能事描写玫瑰艳丽的外表,如巴勃鲁·聂鲁达的“在我这块荒原上,你是一朵玫瑰花。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闭上你那深邃的眼睛。夜神在那里扑扇着翅膀。啊,露出你那颤抖的雕像般的身体吧!你的眼睛深邃,黑夜在里面扑扇着翅膀。你的胳膊细嫩,好似花朵;膝盖如同玫瑰。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12]在男性作家笔下,玫瑰成了肉欲的象征,女子如花般娇艳的容颜成为衡量女性身价的重要法码,女性形象就这样被物化了,成为了男人生活的点缀。由于男权中心文化根深蒂固,大多数女性作家只能因循这种固有的模式,落入传统男权文化对两性关系描述的窠臼,狄金森当初也不例外。

在狄金森早期的诗作里,象征女性阴柔之美的花朵虽然美艳动人、富于装饰性,却无可奈何地依赖于雄性的太阳、蜜蜂或者男性的赞赏者,以求得生命的完整。如:

没有人认识这朵玫瑰——/它很可能漂泊流离, /若不是我从路旁拾取, /把它捧起,奉献给你。

只有一只蜜蜂会思念——/只有一只,蝴蝶——/从远方旅行匆匆归来/在它的胸脯,息歇——

只有一只小鸟会惊异——/只有一阵轻风会叹息——/像你这样的小玫瑰/凋零,多么容易!^[13]

在这里,狄金森通过蜜蜂与玫瑰的结合暗示在两性关系中,象征男性的蜜蜂是主动的、带有攻击性,处于统治地位,而象征女性的玫瑰则是被动的,仅仅充当男人旅途的客栈,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注重的是女人的外在美,难免发出“凋

零,多么容易!”的感叹,折射出审美主体“小玫瑰”即诗人“我”在传统父权文化中的被忽略感和被遗弃感,明显带有女诗人的自怨自艾。这种“女为悦己者容”的思想在狄金森早期诗作中随处可见,如“为你开花,逃出墓地, /让我的花开得成行成列! /请采摘我吧——秋牡丹——/你的花——永远是你的”,^[14]狄金森借花来抒发少女对爱的渴望,想象自己能变成美丽的花,以姣好的外貌来引起爱人的注意和羡慕。然而,联想到诗人在彻底隐退前曾公开发表过四首诗,却被出版界认为“太飘渺,不宜发表”^[15]、“缺乏规范”^[16]、是“阵发性的”^[17]这一事实,这些诗也表达了狄金森事业上的渴望与期待:希望能博得一位男性观赏者的赏识而获得事业成功。

在狄金森早期诗歌中,她常常把自己比作“患单相思痛苦的雏菊”,在黑暗中等待温暖的阳光;将自己比作“为爱慕她的蜜蜂/松开腰带”的蓝铃花,渴望男性赞赏者发现她的价值。面对有着巨大能量的男性世界,面对自己的诗作惨遭男权文化的肢解,狄金森内心充满了矛盾,在写给苏珊·吉尔伯特的信中,她以“花”和“阳光”之间的微妙关系暗示自己对男权社会的复杂情感:“你见过早晨的花朵,满意地享受着雨露的滋润,可这些甜美的花儿在正午的骄阳下垂下了头。你认为这些饥渴的花儿此时会盼望雨露么?不,她们更想要阳光,她们更渴望燃烧的午正,尽管这阳光会灼伤她们的肌肤,对她们也很苛刻。”^[18]

遭受感情和事业双重打击的狄金森终于认识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男人可以成为她的依靠,她挣脱着走出自我泯灭的漩涡,坚定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声音吟唱的决心。她拒绝公开发表自己的诗作,并称“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19]这种对人生、对艺术的执着在狄金森的诗中以一种反传统的形式出现。

在彻底隐退之后,外表艳丽的“花”逐渐从狄金森的诗作中淡出,从男人设立的“美”的梦中醒来。此时,花朵的价值并非依赖别物得来,而是自身的权利,她必须抵抗不利的气候条件以求吐蕊开花,雄蜂则被描绘为侵略者或抢劫者,如“无论什么昆虫经过——/总能带走一点蜜——/按照他饥饿的程度”。^[20]诗人摈弃了早期诗作中哀怨的口吻,采用反讽的方式表露出对男权社会的鄙夷和不屑。在狄金森后期的诗作中,“花”不再是男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它已具备了鲜明的自我意识,“我从未看过荒原——/我从未看过海洋——/可我知道石榴的容貌/和狂涛巨浪。/我从未与上帝交谈/也不曾拜访过天堂——/可我好像已通过检查/一定会到那个地方”。^[21]在这里,狄金森化身为石榴花,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了蜂、太阳和男性的赞赏,却与广袤的宇宙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一种源于自然的力量,会“为取得泥土和阳光的权利——/为生命从事甜蜜的诉讼——”“即使倒毙于寒霜——”,^[22]也在所不惜。这种对艺术的执着使狄金森舍弃了“与上帝交谈”的机会,因为,在她眼里,“上帝”就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男权世界的象征,屈服于“上帝”,把他视为“救世主”意味着个性的泯灭。因此,她强烈地拒绝皈依基督教,以便能“跟随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漫游”。^[23]狄金森一心

一意想到达的“那个地方”不是基督教的“天堂”,而是诗歌的、艺术的至高无上而又永恒的境界。

成功摆脱宗教教义的束缚后,为进一步摆脱男权中心文化的束缚,狄金森拒绝步入婚姻的殿堂。因为她十分清楚,在男权社会里,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温柔而合法的陷阱。它激发的牺牲自我、放弃自我胜过确立自我和肯定自我。将婚姻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是几千年来尚未解放的妇女被羁绊、被束缚的主因,为此,狄金森甘愿忍受隐退带来的痛苦与孤寂。成功走出男权社会樊篱的狄金森充满自信地宣布“花,不必责备蜜蜂——/寻求他的幸福/频繁地登门——/只须教会你的女仆——/再来客,就说,女主人“外出”!”^[24]因为不再考虑社会环境和读者期待问题,狄金森得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从容写作,诗歌成为她内心强烈情感的自然渲泻,容不得理性的手去修改。为打破男性话语模式的束缚,她还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通过解构每件“有限、确定、结构完整、意义充分的事件”^[25]来挑战和颠覆男性话语中心。狄金森把诗歌建立在词组而非传统的重音模式上,因为在她看来韵和整齐的字句是与传统的男性品质相联系的,只会妨碍诗情,使诗情成为畸形。她以破折号取代传统的标点来体现女人的一种直接体验,通过高度省略和跳跃的句法来“保证她安全、忠实精确和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地来描述被禁止描述的妇女个人体验,尤其是愤怒和受抑制的激情。”^[26]

狄金森为人、为诗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个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美国文学直接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成了西方妇女解放的肇端,对人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上帝的敬仰,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开始被强调。随后的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进一步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狄金森所处的时代,清教主义影响已经日趋衰落,在政治上美国已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自尊、自立、自主抉择、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乐观个体主义渗透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一种新的民族感情已经觉醒。在文学上,曾紧跟欧洲文学传统亦步亦趋的美国文学现在强烈要求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特征。深受人文主义、超验主义影响的狄金森更是将个体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她强调人比神更了不起。“耶稣是神,但他首先是个人。”她以现代的、反叛的和平等的目光对待上帝,把耶稣基督从主的位置拉回人间并与之平起平坐。虽然拒绝皈依基督教,狄金森却接受了基督教的生死观。死亡便是灵魂的永生这一基督教的生死观使得死亡在狄金森眼中不再面目可憎,相反使她得到了一种灵魂的慰藉,由此,她可以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为诗而生,为诗而死。也正是这种不顾生死的坚持,使狄金森的诗歌摆脱了李清照诗歌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自悲自怜。

四 结语

通过中西两位著名女诗人诗歌中花意象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从其情感、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折射出的中西方传统文

化的差异:中国女性借花传情,含蓄婉转,欲说还休,西方女性则直率大胆、畅所欲言;中国女性依赖家庭、看重婚姻,西方女性在对待婚姻或家庭上却大有突破。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及世界各文化间的沟通,中西方传统文化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受异域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中西文化主流思想的影响依然强劲,花意象的差异至今依然是中西方文化中两道不同的风景线,为人所津津乐道。

[参考文献]

- [1] 张潮.幽梦影(卷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 [2] [7][8]大学·中庸·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4. 16. 12.
- [3] 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94.
- [4] 朱晓光.岭南本草古籍三种[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
- [5] 宋若莘.女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
- [6]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27.
- [9]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0.
- [10]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11]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72.
- [12] 聂鲁达.聂鲁达诗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13] [14][19][20][21][22][24]狄金森.狄金森抒情诗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21. 15. 223. 119. 119-121. 121. 53.
- [15] Theodora Ward, The Capsule of the Mind, Chapters in the Life of Emily Dickins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26.
- [16] [17] Thomas H. Johnson, ed.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Vol. 2)[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8. 409.
- [18] Thomas H. Johnson, ed.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Vol. 1)[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9-210.
- [23] Thomas. H. Johnson, Emily Dickinson—An Interpretative Biography[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6.
- [25] [26] Bobson, Joanne. Dickinson and the Strategies of Reticence: The Woman Wri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51.

(下转第115页)

个人信息的获得权、更正权、知情权,对档案馆对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同意公开权、限制获取权)。(3)规定对公共档案利用中的公民隐私权的限制,主要为公共利益限制。为了避免《档案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笔者认为在《档案法》修改时应增加“知识产权档案的转让适用知识产权法”的规定比较妥当。其次要对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档案的开放条件、决定开放的机构、开放时间及开放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开放和保密的关系。

(四)关于私人档案和个人档案的利用

私人档案是与公共档案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范畴,在我国以前一直称之为“个人所有档案”。私人档案囊括的范围很广:家谱、族谱及名人的日记、书信、手稿、照片等,均是国家或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原始记录,是了解、认识、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档案法对于私人档案管理的规定还不十分充分,然而规范私人档案的管理对于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却有其自身的作用。此外,针对公民对个人档案利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建议将《档案法》第19条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本人的人事档案及已经开放的档案”。

总之,档案开放是人类民主和文明进步的体现,《档案

法》是实现公民对档案信息知情权的重要法律保障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各个方面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依据。我们期待《档案法》中一些不能适应社会民主建设或忽略社会主体权利保护的内容能够尽快得到修正和完善,通过扩大开放范围、明确档案开放责任和监督主体、加强公民隐私权和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以及设置简便合适的档案开放程序,从而使档案部门的依法治档工作获得更为坚实的法律依据,也使得公民能在更加和谐的秩序下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 [1] 梁宏峰.我国外交档案首次解密包括“暗杀周总理”事件[EB/OL].北方网,http://www.enorth.com.cn.2006-03-04.
- [2] 周林兴 苏君华.被异化的谨慎——对我国档案开放利用现状之评述.中国档案网,http://www.archives.sh.cn/ggfw/zchfg/200412150018.htm.2004-12-15.
- [3] 李 珍.中外档案利用工作现状及其原因浅析[EB/OL].兰台天地网,http://www.archives.sh.cn.2005-12-16.
- [4] 李 薇.档案开放法律制度探微[J].探求,2005,(4).
- [5] 肖友桃.关于档案开放利用中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6,(6).

Some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System of Open Use of the Archives in the Archives Law of China

KONG Hui

(Geology Bureau of Hunan Province, CNNC,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pen use of the archiv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national democracy advance,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exercise civic rights in the know. Although the system of open use of the archives have been evolved in the Archives Law of China, there are many defec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So we must further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to really accomplish open use of the archives in China.

Key words: the Archives Law; open use of the archives; laws and regulations; civic rights in the know

(上接第111页)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lower Images in Li Qingzhao and Dickinson's Poems

ZHANG Xiao-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Abstract: Flower images were frequently us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writers, especially those women writers. Forged by diver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ir uncommon life experiences, those flower images in Li Qingzhao and Emily Dickinson's poems were quite different. Because of strict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Li Qingzhao could not express herself frankly and had to put all her heart into different flowers, especially those graceful and pure flower images which symbolized her noble and elegant character. In all her poems, the tone is melancholy. Dickinson used flower images to symbolize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strong sense of individualism of her flower images made her poems break through and surpass the phallogocentric tradition.

Key words: flower image; Li Qingzhao, metonymy; Confucian ethics; Dickinson; phallogocentric tradition; individualism